

谢国桢 著

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

过的很快，差不多快要五十年了。这半个世纪以来是一个
动荡时期，风云变幻不定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入侵，借团练重
将督政府的统治，因不神也，把许多祖国的文化遺產，圖書和文物
劫去運到臺灣，據為蔣家王朝私有的物，以炫耀於世界。昔

相與此不連，潘陽心等地去訪書。回想起來

305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K248. 305
X439

谢国桢 著

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

过的很快，差不多快要五十年了。这每半个世纪以来，日本一个
 劫后时期，风中走红不定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，借团在重
 符帮政府的统治，因不神气，把许多祖传的文化遗产，图书和文物
 劫去送到台湾，据为持家三朝私月之物，以炫耀于世界。若

K248.305

X439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Ray 6/101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/ 谢国桢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4.1 (2005.1 重印)

ISBN 7-80678-033-5

I. 明... II. 谢... III. 明代历史事件—研究
IV. K248.3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4283 号

策 划 彼岸出版策划室

(汪宇)

责任编辑 竺金琳

金良年

封面设计 程 钢

技术编辑 张绍军

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

谢国桢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32 印张 7.75 字数 216,000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 3001 — 5000

ISBN 7-80678-033-5/K · 6

定价 22.00 元

中华书局重印本前言

承中华书局的盛意，将重印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写的这部肤浅、幼稚的作品，并承商务印书馆同意，我在感愧之下，想对于当年的写作情况略作说明。

在我青年时代，初读明、清史的时候，感到明末东林党争，复社、几社等集会结社活动，与当时的社会、政治关系至为密切，如果忽略这些事实，就很难全面、准确地了解明、清之际的历史。然而有关的史料非常分散零乱，记载又互有异同，于是不自量力，有意把这方面的史事清理出头绪，用通俗的文字、史话的体裁把它写出来。在我开始搜集资料的时候，年纪才不到三十岁，历史知识既不够充分，掌握的资料也很不完备，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，更只是一知半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写好这本书当然是不可能的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总算写出了一个很不像样的初稿，后来几经周折，终于在一九三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想不到在次年十二月，鲁迅先生评论我这部很不成熟的作品说：“钩索文籍，用力甚勤，叙魏忠贤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，说道：‘那时候，……无耻的士大夫，早投降到魏党旗帜底下了。说一两句公道话，想替诸君子帮忙的，只有几个书呆子，还有几个老百姓。’”接着又说：“诚然，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，不明史法，不解在瑜中求瑕，屎里觅道，但能从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，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》二集《题未定草九》）鲁迅先生鼓励后进的至意，坚定了我终身从事于学术事业的信心和决心。时间如驹光电闪，回顾四五十年来真是时光虚度，在学问上无成就可言，深感有负鲁迅先生的鼓励。

至于这本小书，上面已谈到，无论观点上、材料上，问题都是很多的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它还是从庞杂如一团乱丝的资料中，梳理出一些

2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

线索来,仍可供读史者参考。此次重印,基本上维持原样,只校改了个别字句。因此恳切希望读这本书的同志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它,只采取叙事中稍稍有用的部分。

学问之道,本是后来居上。目前开展明、清的研究已提到日程上来,后起之秀,方兴未艾,占有大量资料,写出有分量的新著,尚有待于来者。

谢国桢记于首都寓庐瓜蒂盒

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日

自序

当我草《晚明史籍考》的时候，凡关于明季党争和社盟的材料随手摘记下来，想作一篇明、清之际党社运动的文字。及至《晚明史籍考》草成以后，承袁守和先生厚意，在北平图书馆为我印行。但关于此项史迹，虽然积稿成堆，仍没有把他整理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我从日本归来，仍服务北平图书馆，在编纂室中我把旧稿进行整理。同时朱桂辛先生又约我到营造学社编《营造书目》。那时我惟一的兴趣，就是写这篇文章。其间虽然荒废了馆务，疏忽了学社的属托，但是费了三个月的功夫，终把这篇文章写完成了。

我写这篇文章的宗旨：因我昔年读全谢山《鮚埼亭集》，我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。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，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。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，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，来叙述明、清之际的历史，以唤起民族之精神。我觉得要得到一般读者的同情，还是以语体文写较为便利一些。因此事实则引据原书，叙述则文由己出，但为读者不感枯燥起见，有时文章也不免稍为煊赫一点。

二十二年秋，来中央大学讲授明、清史，就把他拿来作讲义。并且重新修改一下，我感觉所谓“煊赫”的地方总归于不忠实，遂把他删去了，仍抄录原文以存真相。又把重复的地方，重改过，遂成了这篇稿子的样子。并把以前作的《明季奴变考》、《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》附在后面，都为一集。

已经隔过二三年的文字再来校读，时过境迁，思想见解已与昔日不同。结果总觉着不满意，而且现在我治明、清史的兴味已经没有以

2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

前浓厚了。我想由清初以上推到辽、金、渤海的历史，来作东北史整个的研究，又想读点史学基本书籍以药不学之苦。这几篇文章在我的治学史上如白云苍狗已成过去，存此一集，聊觐我治学的过程罢了。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五日记于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员第一寄宿舍。

目 录

一 引论	1
二 万历时代之朝政及各党之纷争	10
三 东林党议及天启间之党祸	31
四 崇祯朝之党争	48
五 南明三朝之党争	67
六 清初顺治康熙间之党争	80
七 复社始末上	99
八 复社始末下	117
九 几社始末	127
十 大江南北诸社	139
十一 浙中诸社附闽中诸社	147
十二 粤中诸社	163
十三 余论	170
附录一 明季奴变考	175
附录二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	198
附录三 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补考	226
附录四 记清初通海案	233

一 引 论

在明代末年，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，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，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。“党”和“社”名词虽然不同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。如今我把党、社的意义和简单的趋势分开来说。

一、党

吾国古代，像汉代的党锢、唐代的清流、宋代的元祐党人，本来就有党争的事情了，但为什么到了明末又会有党争的事件发生呢？吾国最不幸的事，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，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，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，其结果是两败俱伤，所以人民提起来都头痛。但我以为党争的发生至少是一种人民自觉的现象，同时与国家政治的制度也很有关系。所以在—一个不良的政治之下而有党争的事件发生，也可以说是人民自觉的进步。但要是诸党相轧也有极大的危险。杨公达撰《政党概论》引季特尔(Gettell)的话：

政党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单位，根据其选举权的使用，去参加政治，监督政府，以实现其主张。

吾国的党争虽未必与欧洲的政党相同，但我以为党争的发生至少须有两个条件：一是人民必须有发挥言论自由权，一是政府必须有发挥言论的机关，合这两个条件然后才有党争的发生。

在专制时代，人民没有发言的机会，哪会有党争的事情？但是在吾国惟一专制的政局，像秦皇、汉武这样的很少。就是在秦皇、汉武时代也有御史制度之设。《晋书·百官志》：“御史中丞本秦官也。”杜佑《通典》：“初，秦以御史监理诸郡，谓之监察史。”因为在古代，御史

大夫制度是监察政府的机关,其来已久,并且汉代太学的生徒也有发言的权利,即当时所谓“清议和舆论”。所以在政治清良的时代看不出有党争的事,但是到政局崩坏的时候,政府里既然设了弹劾政府的机关,那么一般秉公正的人都要去弹劾政府,而一般读书的人也要借机会来谈论国是了。

到了明代,内阁的权较低,而御史的权更高了,并且读书的人也有发言的机会,这不能不算政治的进步。所以我们要研究明代党争之所以发生,不能不先明了明代的官制。

明代虽沿着汉、唐的旧制,但监察机关的权特别的高。明代的官制是: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,析中书省之政归到六部,以尚书任天下事,侍郎贰之,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。殿阁大学士的黜陟由于阁臣的会推。到了宣宗时候,政柄无论大小,悉交大学士杨士奇等办理,内阁的权日重。到了严嵩等当朝,权更高了,和真宰相差不多,六卿皆归内阁节制。这是明代的行政机关。同时监察的机关是御史和六科给事中。御史之职,直隶于都察院,有都御史、副都御史、佥都御史的设置。《明史·职官志》云:

(洪武)十六年,升都察院为正三品;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,正三品;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,正四品;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,正五品;经历一人,正七品;知事一人,正八品。十七年升都御史正二品,副都御史正三品,佥都御史正四品,十二道监察御史正七品。建文元年,改设都御史一人,革佥都御史。……宣德十年,始定为十三道。……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。……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、佥都御史衔者,有总督,有提督,有巡抚,……及经略、总理、赞理、巡视、抚治等员。

御史的职权,《明史·职官志》云:

都御史职,专纠劾百司,辩明冤枉,提督各道,为天子耳目,风纪之司。凡大臣奸邪,小人构党,作威福,乱政者劾;凡百官猥茸贪冒,坏官纪者劾;凡学术不正,上书陈言,变乱成宪,希进用

者劾；遇朝覲考察，同吏部司贤否陟黜，大狱重囚会鞠于外朝，偕刑部、大理讞平之。其奉敕内地，拊循外地，各专其敕行事。

十三道监察御史，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，或露章面劾，或封章奏劾。……勉励学校，表扬善类，剪除豪蠹，以正风俗，振纲纪。凡朝会纠仪，祭祀监礼，凡政事得失，军民利病，皆得直言无避，有大政集阙廷预议焉。

给事中的官职及其职权，《明史·职官志》三云：

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各都给事中一人，正七品；左右给事中各一人，从七品。给事中，吏科四人，户科八人，礼科六人，兵科十人，刑科八人，工科四人，并从七品。六科掌侍从规谏，补阙拾遗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。凡制敕宣行，大事复奏，小事署而颁之。有失，封还执奏。凡内外所上章疏下，分类钞出，参署付部，驳正其违误。

御史是监督内阁的机关，六科给事中是稽察六部的机关，并且有封还章奏的权力。至铨叙的机关是吏部，吏部黜陟的责任，惟一是考察。《明史·职官志》一云：

凡内外官，给由，三年初考，六年再考，并引请九年通考，奏请综其称职、平常、不称职而陟黜之，陟无过二等，降无过三等，其甚者黜之罪之。京官六年一察，察以巳、亥年；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，降罚有差；四品上自陈，去留取旨。外官三年一朝，朝以辰、戌、丑、未年，前期移抚按官，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，汇送复核，以定黜陟。

同时内监为君主的近侍，是传达命令，出纳章奏的机关，他的权柄也很大。《明史·职官志》序上说：

内阁之拟票，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，而相权转归之寺人，于是朝廷之纪纲，贤士大夫之进退，悉颠倒于其手。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，间有贤辅，卒蒿目而不能救。

由上诸端，我们可以明白明代的官制：（一）行政机关，内阁仅备顾问，责任六部，共任天下的事。（二）监察机关，御史大夫是监督政府的机关，六科给事中是监察六部的机关。（三）铨叙的机关，大臣是会推，小臣是考察，吏部的考察是进退官吏的惟一机会。观以上的制度，似乎是很完备了，但到明代中叶却发生了变化。内阁的权高了，六部不能不听命于内阁，铨叙的使命也就不能公平。御史大夫监察的机关不能不出来弹劾政府，政府自然而然的与言官相水火了。言官是代表一般的舆论，人民多同情于言官，所以言官的清望日高。内阁的势力稍一低落，则不能不勾结言官，御史大夫们哪能个人人品靠得住，所以就自己分了党派。自张居正以后，一班庸愚的宰相，像沈一贯、王锡爵之流，他们只知道巩固地位，传衣钵，哪知道国家的大计。东寇日逼，朝事日纷，那一般内监们趁着机会起来，攫夺了政府的实权，宰相们反得听命于内监，御史大夫和六科给事中与内监成了对敌的现象，那时候党祸之势就成了。

凡万历时代之朝政，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国本论、三王并封、建储议、福王之国、楚太子狱、科场案、辛亥京察、丁巳京察、《忧危竝议》、妖书、熊廷弼案等事，一直到挺击、红丸、移宫等三大案，这都是他们的争端，凡当时纷争的人，像东林、齐、昆、浙、宣等党，是他们的党派。他们讨论的焦点拿现在的眼光来看，似乎过去；但他们倔强不挠的精神，是可佩服的。

到了天启年间，魏阉当政，昆、浙、宣三党投降了内监，把以前最纷乱的案件都归纳到三大案里面造成了《三朝要典》、《东林党人榜》等书，可算是把东林的势力压下去。但崇祯初立，销毁《三朝要典》，更立逆案，东林的势力又膨胀起来。但我们看崇祯一代，钱谦益、周延儒的相争，周延儒、温体仁的相倾，袁崇焕的被戮，郑鄞的获罪，姜埰、熊开元的廷杖，他们的背景都脱不了两党的暗斗，而把东酋的侵略，仿佛形若无事的一样。一直到了北都不守，清兵南下，福王弘光帝即位南京，半壁的天应该和衷共济了。但福王之立，马士英、阮大铖重修《要典》，伪太子、伪皇妃之狱都脱不了党争的纠纷。可怜隆

武伏处福建，鲁王监国海岛，他们还要辨白叔侄的名分，桂王仅有云、贵两省，他们臣子还分了吴党、楚党，直至咒水之役同归于尽，才算完事，这真是又可悯、又可笑了。

平心而论，魏党的跋扈，祸人误国，固不足道；但东林太存意气，在形如累卵的时局，他们还要闹家务，还存门户之见，置国是于不问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但是一般无耻的士大夫，明代覆亡之后，既入仕新朝，就好好作官罢了，他们在一个雄猜之主康熙帝的掌中，偏偏的要斗一点心智，自相倾轧，假道学的名义来行其奸诈，士大夫的气节就此扫地，真可谓党争的末路了。这一套的假面具，我们不能不为他揭破。

由上我们看来，在万历年间东林和三党之争，他们所争的有宗旨、有目标。到了魏阉专权以后，他们好像闹家务，目标和宗旨都完全失去。因此我们可以断定，万历年间是东林与三党相争的时期，天启间是魏党专横的时期，崇祯至永历是两党相轧的时期，康熙初年是党争的末路。

二、社

“社”这个名词，来源很久，《说文》社字下云：“地主也，从示土。《周礼》二十五家为社。”人民在所住的地方，祭他们所居住地方的神祇，封土以为记号，那就是社。《周礼》所谓社是祭神的地点，春、秋是祭社的时间，因此有春社、秋社之称。《周礼》所谓州社，《左传》所谓书社、千社，汉代有乡社、里社的名称，由社为一地之主，因其地而引申为社会的组织。后来习武备的叫作社，文士的结合也名作社，像晋代的惠远莲社，宋代胡瑗的经社，元代的月泉吟社，这都可以说明代结社的起源了。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八“释社”条云：

《日知录》谓社是盗贼之称，明学士称同社不知其意，其论甚快。今按社歇后语也，祭社会饮谓之社会，同社者同会也，古有莲社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有孙觉《春秋经社要义》六卷，《宋史·孙觉传》云：“胡瑗弟子千数，别其老成者为经社。”吴自牧《梦粱录》

云：“文士有西湖诗社，武士有射弓蹋弩社。”又有诸集社名目，元有白莲社、月泉诗社，明复社多八股语录，几社多奇士伟人。我朝顺治九年，礼部颁天下学校卧碑第八条云：“禁立盟结社。”十七年，又以给事中杨雍建言禁妄立社名，及投刺称同社同盟，则以八股牟利，假借社名也。十六年例则士习不端，结社订盟者黜革。康熙二十五年，查革社学。雍正三年，定例拿究。皆非社而冒称社，俗之蔽，士通文曰词坛、曰吟坛，亦社坛也。……

由于明嘉靖大江南北以及山、陕个别地区社会经济极为繁荣，水陆交通也很便利，所以文人的社集到了明季最繁盛了。但是为什么到了清代有这样的严厉禁止，这很有研究的价值。我们知道明代以八股取士，作八股的须要识得风气，知道一时的风尚，文章才不至落选。比方《儒林外史》上马二先生说：“本朝洪、永是一变，成、弘又是一变。”文章要变的时候，这非揣摩他的风气不可。所以一般书店就借此机会，选出几篇文章来牟利，而这般书店的老板非借重一般选家，或者可以说是操选政的名手不可，所以马二先生之流就可以在西湖上大出风头了。

因此一般士子们集合起来习举业，来作团体的运动就是社，他们或十日一会，或月一寻盟。杜登春《社事始末》云：“几社六子，自三、六、九会艺，诗酒倡酬之外，一切境外交游，澹若忘者。”并且社事的集会，有读载书歃血等事，所以又名作社盟。而他们集合同社的文章，选出来就是社稿。只要社稿能得一时人的景仰，那么他的社一定可以得到势力了。

在万历、天启年间，江西艾南英、陈际泰、章世纯这一般人，他们号召拿成、弘派的文章来改革当时的风气。当时一呼百应，很披靡一时，艾千子常从南昌跑到江浙苏杭的地方去选文，他的势力就此可以概见。

那时候太仓的张溥，他利用这个机会，就将张采等所成立的应社与孙淳、吴翱所办的复社合并，第一步就提倡熔经铸史的方法来改革主张成、弘派的文章，不久他的社员皆中了高科，这是他的计划成功

了。第二步他就利用以群众作后盾去干涉政治，明崇祯间的宰相可以由民意去更换，这时候一般读书人的势力有这样的伟大。所以我们看吴应箕的《复社姓氏录》上，他联合全国的士子不下二三千人，他综合北至山东、南至湖广的小团体不下有数十个。这样的状况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，就是东汉的党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所以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，文有文社，诗有诗社，普遍了江、浙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北各省，风行了百数十年，大江南北，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，应运勃兴。那时候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，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，提倡风雅，从事吟咏（见《照世杯》小说），而那些考六等的秀才也要夤缘加入社盟了（见二刻《增补警世通言》小说）。

社盟的成立既然这样的繁盛，他们结社会朋，动辄千人，白下、吴中、松陵、淮扬都是他们集会之所，秦淮河畔桨声灯影，虎丘池边塔影夕阳，桃叶问渡，小院留人，这种景况我们读了王士禛的《秣陵新诗》“十日雨丝风片里，浓春烟景似残秋”的诗，仿佛还见其迹。张天如的《国表序》说：“社集之开，胥闾之间，维舟六七里，平广可渡，一城出观，无不知有复社者。”陈去病的《五石脂》说的更好：

据父老传说，第就松陵下邑论，则垂虹桥畔，歌台舞榭相望焉，郡城则山塘尤极其盛。画船灯舫，必于虎丘是萃，而松陵水乡，士大夫家咸置一舟，每值嘉会，辄鼓棹赴之，瞬息百里，不以风波为苦也。闻复社大集时，四方士子之拏舟相赴者，动以千计，山塘上下，途为之塞。迨经散会，社中眉目，往往招邀俊侣，经过赵李，或泛扁舟，张乐欢饮。则野芳滨外，斟酌桥边，酒樽花气，月色波光，相为掩映，倚阑骋望，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，吞吐照乘之珠。而飞琼、王乔，吹瑶笙，击云璈，凭虚凌云以下集也。

在这流连诗酒、谈笑歌舞的当中，猛然霹雳一声自天而降，想不到的清兵自北而来，无情的铁蹄踏破了金陵，扫荡了河山。这一群士子由诗酒结社之逸情，一变而为杀敌灭仇的伟举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有

志的青年大半都为国牺牲了性命，颓废的老者也入山当了和尚。那时候满洲贵族与汉族的军阀官僚勾结起来，清兵由江苏一直杀到广东，我们的汉族人民至死不屈，就是留下一二的残黎，像王翊、李长祥等人，他们还在浙江的大兰山，安徽的英山、霍山，依岩结寨，闹了五六十年。我们知道他们惟一对敌的方法就是抵抗，他们自卫的方法就是不屈。像这般有为的青年大半是社局中人。到了时过境迁，澄江一碧，惟余呜咽之水和两三点寒鸦的晚噪，渔夫樵子们还在那里唱着山歌。静寂的山光，无情的烟水，这些壮士的英灵又上哪里去了。我们读了孔尚任的《哀江南曲》，真有不胜今昔之感了。因此在社集的活动方面，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：

（一）嘉靖到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，是社集萌芽的时代。

（二）崇祯年间社局，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的运动。

（三）弘光以后，由政治的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的运动。

我们综合“党”、“社”两件事看来，党的起始建设的意思很好，但他的结果教我们很失望；社的起初不过是论文的集会，但他的结果变成了社会上革命抗清的运动，在吾国民族精神上应当表彰的。

三

以上党社的情形大概如此。至关于党社的文章在我未作此篇以前，朱谔先希祖先生指导他女儿朱倬撰有《南应社考》、《中江社考》、《读书社考》等篇，对于党社的一部分已经有很精详的撰作，但我为什么还要写这篇文章，我不能不叙述一下：

（一）“党”与“社”是在吾国近古政治上和社会上是很要紧的一种运动，与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的兴起很有关系，要知现在党的建设，不能不知以前党的来源和他的背景。

（二）明代万历年间的政治最为复杂，像三王并封等事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京察诸事与明代的制度却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不能不明白他的最简单的历史。

（三）由东林党的发生一直到社事的终止，差不多有百年之久，

这里边的变动很多,很可以见到明末清初的社会状况。

(四)南明虽然不久就灭亡了,但是与吾国民族兴亡史上很有关系,我们必须加以研究。

(五)我们要知道,明代阉党最利害的时候就是清兵入关最紧急的时候。这是极应注意的一件事。

我怀着这五个思想,所以想把党社的来源和背景作一个有系统的介绍。至于考证精湛的作品,还希望将来专家补助我的不足。我作这篇文章,我最诚恳的声明:我不是要争奇斗博,来夸耀我的作品。我们要明白的是明末清初的几个书呆子、受压迫的民众,他们不怕清兵的铁蹄,就是粉身碎骨他们都甘所不辞。这就是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,这就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地方。中华虽然屡遭外族的侵略而能长久存在的精神在此。以往的先烈们看来是失败了,但他们的成功也就在此。诸君要注意,凡是为我民族造幸福,凡是事业成功的创造者,都是受压迫的人呀!